

剖析「抗日戰爭第二次淞滬會戰」之研究

作者陸軍備役上校王立民

提要：

- 一、民國 26 年的中國對日抗戰爭「第二次淞滬會戰」，為何在時近 21 世紀現代的戰爭，仍為第二次波灣戰爭伊國海珊所重視？其所實施「焦土政策」及全民「抗敵禦侮」作為，將伊國城鎮轉變為中日「淞滬會戰」城市沼澤戰，數度陷極優勢美軍於槍林彈雨巷戰不利狀況。我國軍幹部應審慎剖析、領悟本會戰的經驗與教訓，因應創新剋制共軍武力犯台的戰法，此為本篇研究之目的。
- 二、民國 26 年 8 月 13 日，日軍海軍陸戰隊向我駐滬保安隊發起攻擊，淞滬會戰正式揭幕，歷經四個月的喋血奮戰，迫使日軍由華北戰區及國內抽調精銳增援部隊馳援，推翻日本「不擴大」、「以戰養戰」的戰略，並更改其「由北向南」的作戰線，轉為「由東向西」不利作戰線，奠定我國抗戰勝利之基礎。
- 三、綜合檢討：（一）日軍：（1）上下不一、貌合神離。（2）判斷錯誤、逐次用兵。（3）戰略不當、戰術錯誤。（4）窮兵黷武、兇暴殘忍。（二）國軍：（1）高瞻遠矚、掌握勝算。（2）改變戰線、開創勝機。（3）物力遷移、厚植戰力。（4）振奮士氣、英勇抗戰。（5）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。（6）訓練精良、士氣高昂。（7）從容自持、死中求生。
- 四、經驗啟示：（一）將帥韜略、運籌作幄。（二）建立嚇阻、導彈部隊。（三）經營戰場、保存戰力。（四）全民國防、戰勝憑藉。

五、1996 年美國介入臺海爭紛，使中共戰爭觀產生根本性改變，其「深化科技練兵」作為，我國軍幹部決不可以漠視之，在兩岸軍事實力我消敵長之際，我們決不可依靠外力，應審慎研析對日抗戰「第二次淞滬會戰」，以因應中共軍事的轉變，落實建立具有「嚇阻的國力」，使中共知難而退不敢犯台，此為「安國全軍」的真諦。

壹、前言

民國 26 年，中國對日抗戰「第二次淞滬會戰」，為何在時近 21 世紀「立體、大縱深、非線性」、「首戰即為決戰」的現代戰爭型態，仍會為伊國總統海珊所重視？為何其於戰前動員龐大學者運用各種理論剖析「淞滬會戰」，可知其欲獲得「以小博大」、「以弱敵強」、「全軍破敵」、「破敵全軍」等「變」與「不變」之相關理論，意圖將巴格達城鎮轉變為沼澤，將伊國眾多的建築物化為叢林陷阱，陷美軍於槍林彈雨巷戰等不利狀況下。此種特質是避開牛角而把劍刺在牛背和頸部，造成聯軍重大傷亡、頭痛而陷於精疲力竭、處處受限，有力無處使、陷於被動挨打等不利狀況，戰爭期間多次令美英聯軍處於「無奈」的地位，在不傷及百姓的忌諱下，常造成英美雙方諸多的軍事行動無法動彈。

當前中共多次說明對台採「和平統一、一國兩制」的政策，但由江澤民去職前對中共新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囑咐：「對台採取軍事行動，宜早不宜遲^①」，及胡錦濤提出「和平崛起論」^②，強調對臺「不戰併臺」、「臨界威懾」、「阻美奪臺」的三戰思維，為其新世紀戰略思維等等跡象，可以判斷中共在「和」與「戰」兩手策略，正逐漸向「戰」方面準備。尤其中共於 2000 年 10 月 13 日，所舉行「世

註①，中華日報綜合報導，《對台動武宜早不宜遲》，（台北：中華報第一版，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四日）。

註②，胡錦濤，《中國的發展，亞洲的機遇》，（北京：2004 年 4 月 24 日，<http://www.chi-na.org.cn/>）。

紀大演兵」，為期四天的「現地演兵」、「理論交流」與「網上練兵」，已突破超限戰的限制。2005 年中俄「和平使命聯合軍演」中，共軍以俄軍為師，借為期 8 天三軍聯合軍事演習，考驗「制空」、「制海」及「兩棲登陸作戰」中，如何以「新觀念」、「新武器」突破超限戰的理論，其演習規模之大、時間之長、參演人數之多、動用兵器之先進，實為前所未有，共軍驗收「超限戰」的新觀念、新武器，與深化科技練兵的作為，殊值吾人警惕，不宜忽視。

臺灣民間智庫「臺灣高等政策研究協會」秘書長楊念祖對「華盛頓觀察」週刊表示：「從戰略的角度上來看，北京明顯是拉攏俄羅斯來脅迫臺灣，最後參與美中兩強的對抗，至少臺灣方面有這樣的一個理解，那就是軍演是衝著臺灣而來的^③」，中共挾其日漸繁榮的經濟優勢，大肆挹注國防預算，進行現代化軍力組建與作戰架構轉型，致使其軍事力量已衝擊區域軍事平衡，並威脅台海兩岸和平與安全，殊值吾人警惕，不宜忽視。我國軍幹部面對習於隱藏真正意圖，偏好採取欺騙手段的中共，要注意其國防白皮書常強調：「強化贏得制海、制空及執行戰略反擊戰力」，並規劃 2006 至 2010 年期間，其主要目標為「創造更具有戰力的聯戰部隊，以達恫嚇中華民國、遲滯美國干預並隔離日本制衡的多重目

註③，華盛頓觀察週刊，《中俄舞劍志在臺灣》，（美國：華盛頓觀察週刊第 30 期，2005 年 8 月 17 日）。

<http://www.washingtonobserver.org/big5/taiwan-jointexercise-081705cn142.cfm/2005/9/25>

的」之威脅，及早應以第二次「淞滬會戰」，與波灣戰爭「巴格達」之役，針對城鎮作戰「未來性」、如何「察知戰機」、「掌握戰機」、「創造戰機」、「改造戰機」，以兵、火力密切配合，執行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戰略構想，遂行連續反擊，改變敵我優劣形勢，殲敵於灘頭及城鎮間，如此方為有效剋制共軍「縱深立體、立體攻擊、重點突破、整體割列、分區殲擊、攻城攻心、穿插分割」城鎮作戰戰法，此為本篇研究之目的，方能務實達我國古人所說的「懲前毖後，鑑往知來」之境界。

貳、第二次淞滬會戰戰前一般態勢

一、戰前遠因

日本進行「明治維新」，勵精圖治成為先進的國家，進入強國之林，我國推翻滿清帝國，建立了中華民國，但連年戰禍，社會混亂，工業落後，無法與日本國力相提並論。日本此時提出「大陸政策」，有計畫、有準備的蓄意挑釁^④，於民國3年11月6日侵佔我青島，搶佔膠濟鐵路奪取礦區，民國4年迫袁世凱大總統承諾將中國「文化、國防、經濟」交付日本代管，民國17年4月再度出兵山東，攻佔濟南，阻擾我革命軍北伐，民21年2月我東北三省（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）及錦州、哈爾濱均為日本佔領，並建立其「滿州國」，由清廢帝溥儀執政，日本瘋狂侵略中國，造成國人紛紛發起「抗日救國運動」。

當時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考量，我國戰力遠遜於日軍且國內共黨猖狂、汪精衛鬧分裂，乃於廬山昭告全國軍

註④，蔣緯國著，《抗日禦伍第3部第5卷》，（臺北：黎明文

化事業公司，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），頁三一。

民「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，準備應戰，而不求戰，若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…人人守土抗戰…犧牲一切…贏得最後的勝利」，民眾瞭解政府苦衷積極支持政府備戰準備。民 21 年日軍向我上海地區發起攻擊，我第 19 路軍反擊重挫日軍，多位將帥成了家喻戶曉抗日英雄。民 22 年至 25 年，日軍多次向熱河、東北、山海關、長城內外、發動數次攻擊，均為我國軍反制無果，尤其民國 25 年 8 月，日軍要求我政府將華北地區讓給日本，日本侵略中國種種不法行動，使我國已無退讓餘地。

七七「蘆溝橋」事件後，日軍企圖以不流血侵佔「松滬」，危脅南京迫我簽訂城下之盟，進而統一我中華民國之癡夢。此時戰爭氣氛瀰漫全國，蔣中正先生再度發表告示全國書：「戰爭既起，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幼，均應抱定為國奮鬥之決心，若有中途妥協，喪失寸土寸地，即為中華民族歷史罪人。軍人守土有責，雖戰至一兵一槍，亦必與敵抗戰到底。^⑤」的持久戰爭。我最高當局鑑於日軍積極準備備戰作為，認為日軍將發動攻勢，乃密令張治中針對京滬地區山洞、涵洞、橋樑、隧道、坑道、壕溝、堅固建築物、地下室、大樓間隙、高大建物秘密構築簡易工事，期於戰爭無法避免時，能利用作戰地區工事形成障礙，乘日軍戰鬥部隊（步、戰）及戰鬥支援部隊（砲兵）受限於街道時，以「小群多股」、「多路游擊」，運用集束炸藥行「正規」及「非正規」戰法，逐次消耗日軍

註⑤，方德祥著，《紀念七七抗戰憑悼英烈》，（臺北：陸軍學術月刊 431 期，民國九十年七月十六日），頁八。

戰力，殲敵於洋澄湖-澄湖-澱山湖之間的常熟、吳縣地區。

而後基於全般情勢又悄悄在江陰、無錫間以鐵絲網、鋼材、詭雷及其他人工障礙物混合設置，構成多層次之阻絕系統，達成阻止敵之接近，封鎖其進路，侷限敵於國軍所望之游獵區間，以利爾後遂行連續逆擊軍事行動。同年7月中旬，駐淞滬之日軍多次以汽車載運武裝士兵，於上海地區向國軍挑釁，並指派其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率兵一名，故意乘車衝入我虹橋機場，我守軍保安隊鳴槍示警無效，乃開槍將其擊斃，日軍即以此為藉口向我軍提出無理要求，並向淞滬地區集中軍艦30餘艘，上海日租界亦實施軍事動員，編組其僑民連同駐滬海軍陸戰隊6千餘人，共計1萬5千餘人，中日雙方遂進入「準戰爭」的階段。

二、作戰地區地略形勢（如要圖一）

淞滬會戰作戰地區廣及京滬、杭州，位居我國東部沿海之中央、長江下游之南岸、華北大平原之南緣，介於長江與杭州灣之間，區內東南地勢平坦、海岸線平直，毫無港灣之利。西北則為丘陵地帶，標高約為200-400公尺之間，另有孤立之小丘分佈於浙寧、常熟、無錫各地區，境內河流溝道縱橫，湖泊池塘羅佈佔總面積約四分之一（河道幅度多為100-200公尺，通常不易徒涉），京滬路之南濱湖諸縣及長江南岸，由楊州至蕪湖地區，地勢低窪常有氾濫情形發生，沿海一帶均構築防湖塘多處堤岸，對雙方軍事行動均有限度影響。

湖泊最大為太湖，全面積約為3千6百餘平方公里，太湖北有隔湖、東有洋澄湖、澱山湖，環繞太湖周邊大、

小湖泊群，正橫互於作戰地區中心，除太湖在軍事行動上為一障礙，其餘大、小湖泊影響有限。本區鐵、公路密如蛛蜘蛛網、交通便利，鐵路計有津浦、京滬、滬杭、浙贛等諸線：公路有京滬、京杭、杭徽、杭江等幹線，雖屬碎石路面，但構築堅固車輛運行良好，水運海洋及長江運行吃水深約為 24 呎，巨型船艦進出無阻，黃埔江與錢塘江及太湖，邊緣各河流可通行 40 噸小汽船，為自鎮江至杭州運何因年久失修，河道淤塞已失去航道運輸功能，在軍事上無多大功能。本區沿海多為沙灘，沿海及沿長江可登陸灘頭計有：吳淞、川沙、瀏河、白卯口、許濮口等地。

三、雙方戰力之比較

(一)日軍：日本於明治維新後、政治穩定，吸收西方國家科學知識、工業技術、軍事思想、教育制度，於 1900 年已躋身國際強國的舞台，至 1905 年戰勝俄國後成為世界列強之一，舉凡其戰爭武器如飛機、戰車、火砲、船艦、車輛、生化武器等，均能由其國內工廠自行生產。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其動員金屬工廠達 6 千 6 百所，化學工業工廠 4 千 3 百所，軍用武器裝備工廠 34 所，民用軍需工廠 2 萬 2 千餘所，故其戰爭所需軍品武器供應，短期間不虞匱乏⑥。

日軍現役官兵 38 萬人，預備役 72 萬 8 千人後備役 87 萬 9 千人，第一補充兵役 105 萬 9 千人，第二補充兵

註⑥，王立民著，《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》，(臺北：陸軍學術月刊第 33 卷第 383 期，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六日)，頁四十九。

役 90 萬 5 千人，合計 448 萬 1 千人，戰時人力動員後可達 2780 餘萬人，其三軍兵力：陸軍常備師團 17 個（可三倍動員），每個師團員額 22000 人，馬 5800 匹，步騎槍 9500 枝，輕重機槍 600 餘挺，各式火砲 108 門，戰車 24 輛；海軍擁有艦船 190 餘萬噸（居世界第三位），並秘密建造世界最大戰艦太和號、武藏號；空軍擁有陸軍飛機 1480 架、海軍飛機 1230 架，共約 1700 架。

（二）國軍：我國土地、人口、資源遠優於日本，但辛亥革命後，內戰不休，迄「七七」事變時，仍停留於農業社會，僅沿海大都市與長江下游，有部份輕工業，餘均為手工業，工業與科技落伍，生產力薄弱，除輕兵器外，所有武器裝備均無能力生產，必須仰賴國外進口。當時現役志願兵 170 萬人，其他預備役、後備役、國民兵一概均未建立，陸軍步兵 182 個師、46 個獨立旅、9 個騎兵師、4 個砲兵旅、20 個獨立團，每個師兵員為 10922 人，步騎手槍 3800 餘枝、輕重機槍 320 餘挺、迫擊砲及小型火砲 48 門，各部隊員額、裝備均普遍不齊全，很多部隊戰鬥訓練仍偏向大刀肉搏。

當時甚多國外記者評述：「日軍一個師團的戰力，可與中國編裝完整的三個師團對抗，尤其現在國軍編裝欠缺甚多，日本一個師團可輕易對付 8-12 個中國師作戰⑦」；海軍新舊艦艇 66 艘（最大者 3000 噸、最小者 300 噸）魚雷快艇 12 艘，總計 59000 噸；空軍各式老舊飛

註⑦，吳玉貴著，《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（一）》，（日本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；臺北：國防部史編局，民國七十九年），頁一五。

機 600 餘架。就中日雙方交戰國總體戰力而言，無論陸、海、空軍，武器裝備來源、編裝訓練、官兵素質、戰術戰法、聯合作戰後勤補給能力等，與日軍相比瞠乎其後，雙方師級步、砲火力發射速度火力評分如附表 1，雙方指揮系統表如附表 2、3。

一、作戰構想

(一)日軍

明治 15 年（清光緒 8 年，西元 1882 年）間至甲午之役終結之際，日本「國防方針」中首次以中國取代俄國成為其「第一號假想敵國」字眼，至大正 7 年（民國 7 年，西元 1918 年）又在「國防方針」中「復將中國加入為假想敵國^⑧」，爾後日軍在「滿州事變前後之國防政策」資料中就，認為當時中國戰力不足無法與其抗爭，故大言不慚道：「陸海軍均認為以其部份兵力即可予以因應^⑨」。

淞滬會戰雖是日本故意製造「虹橋事件」而觸發，然就日本大本營之蠶食侵略政策而言，仍旨在配合其華北方面之攻擊（包含平綏、津浦、平漢路作戰及太原會戰），以威脅我首都南京屈服我意志，加速達成其「速決」之戰略目標，故其在發動侵略之初，日軍基於大本營既定之所謂「不擴大」方針，以有力之海軍於上海市區外圍迅速擊滅我軍，盡量避免陸軍參戰本役，待其入侵海軍

註^⑧，曾清貴譯，《從日俄戰爭到蘆溝橋事變》，（日本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；臺北：國防部史編局，民國七十八年），頁五六一。

註^⑨，曾清貴譯，前揭書，頁三〇。

陸戰隊將有被殲滅之危境時，日本大本營始更改原戰略構想，緊急動員 2 個師團馳援，其後陸續增援到 9 個師團以上兵力，其戰略構想：「派遣軍初期不擴大戰事及保僑為目的，以有限兵力於上海市區外圍迅速擊滅敵軍，就地解決上海事件，若戰事擴大，則以有力一部於敵側背登陸，力求速戰速決先擊滅當面之敵，再繼續沿太湖兩側攻擊，奪取南京，迫敵媾和。」^⑩

（二）國軍

「蘆溝橋」事件爆發後，日軍即以緩兵之計及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陷我平、津要地，繼之西犯南口、南臨津浦路，正當平津路當面之敵、我劍拔弩張之際，淞滬面日軍亦乘機蠢動以求策應，我最高統帥部針對日軍之作戰構想，除抽調一部北上增援外，同時亦以精銳之師向淞滬地區緊急運動。

8 月 7 日我國防會議決定全面抗戰到底，命令京滬張治中任命為第 9 集軍團總司令（將京滬警備部隊改編為第 9 集團軍）向淞滬地區推進，並於 15 日頒佈淞滬戰略構想如下：「國軍採持久作戰，確保南京要地安全之目的，初期以優勢兵力迅速圍殲上海之敵，奪其登陸要點，使敵爾後增援、登陸困難；如其增援登陸成功，則採持久作戰，誘使其向淞滬地區轉用兵力，行守勢作戰、遲滯、消耗敵之戰力，並乘機轉移攻勢，殲滅其主力，摧毀其速戰速決之企圖。」^⑪

參、作戰經過（如要圖二、三）

註⑩，王立民著，前揭書，頁四十九。

註⑪，王立民著，前揭書，頁五十一。

民國 26 年 8 月 9 日，日軍武裝官兵侵入上海虹橋機場警戒線滋事，並集結兵艦以一部海軍陸戰隊登陸，期威脅我駐滬保安隊撤軍，經我駐軍嚴詞拒絕後，13 日日軍令駐滬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約萬人，向我保安隊發起攻擊，淞滬戰役正式揭幕，我統帥部令張治中率 3 個師迅速馳援上海作戰區。13 日當晚國軍第 87 師利用地形、地物接近戰場，神出鬼沒迅速佔領滬江大學，第 88 師與滬西紗廠日軍激戰，官兵視死如歸一舉攻略持志大學、八字橋，令日軍感於戰略翼側受到威脅，驚惶失措迅速撤軍。15 日國軍第 9 集團軍司令指示，上海警察及保安隊增援該兩師對據守上海市區，約 15000 人日軍發起第二次總攻擊，攻擊重點為日軍陸戰隊駐地，歷經 3 次攻擊 18 日攻抵制虹口及橫濱之線，日軍不斷抽調後續增援兵力馳援，我軍不畏敵擁有三軍優勢兵火力投入戰場，官兵浴血奮戰迫敵困守工事內，以待其國內援軍馳赴戰場增援。此時我國軍因欠缺重武器故無法攻破堅強日軍據點以收殲敵之效。20 日晨國軍發動第 4 次總攻擊，貫穿日軍核心陣地後，準備實施四周包圍戰術時，日軍大本營抽調大批艦隊運輸海軍陸戰隊於吳淞口附近登陸，敵機此時支援地面部隊作戰非常頻繁，致使全般形式頓行改觀，迫使國軍不得不終止攻擊，使可期之勝利，未竟全功，敵我雙方地面部隊對峙於吳淞-江灣之線，戰況膠著，而後基於戰術重點國軍將主力部隊轉移至吳淞口方面。

8 月 22 日晚，日軍第 3、11 師團及第 8 師團第 4 旅團、第 1 師團的第 1 旅團，於川沙、施子林、寶山同時

登陸，向寶山、羅店、瀏河之線南犯，擊破國軍擔任該地區守備之江蘇保安團隊，正揮軍奪取沿江各要點。24日我軍以陳誠增援部隊對日軍實施反擊，唯日軍以海、空優勢火力密切支援地面部隊作戰，反擊未能達預期效果。29日至9月7日止，國軍遭日軍陸、空協同作戰，向後轉進至北站、江灣、廟行、廟王廟、羅店及雙草墩之線，雙方戰線呈犬牙交錯、戰況混沌不明，國軍在日軍海空優勢火力攻擊下損失慘重，戰區司令決心調整部署改採守勢作戰，期借有利地形消耗日軍戰力。

9月17日陸續到達淞滬地區之日軍，計有第1、3、11等師團，及第6、8師團及16師團之一部，約共10萬人，各式火炮300餘門、戰車200餘輛，並於鴨窩沙高球場、泗洲島等處，構築簡易的前進機場（飛機增援作戰最高曾進駐達200餘架）。與國軍顧祝同所指揮的朱紹良、羅卓英、薛岳等3個集團軍對峙於北站、劉行、施相公廟、瀏河之線，雙方進行多次陣地爭奪戰，日軍以第1、3兩師團主力進犯劉羅公路，後因我總預備隊（6個師）投入戰場實施多次逆襲，日軍前進受阻無進展。

22日日軍以機群、戰車猛攻並施放大量煙幕，令第一線國軍誤判日軍實施生化武器，因缺乏防毒面具一度造成戰線頓亂，日軍乘機發起突穿攻擊，突破我軍多處防線，國軍第57師發起逆襲一度收復失土，但因日軍投入增援部隊，國軍被迫向蘆藻濱南岸、陳行、廣福、施相公廟、瀏河之線轉移陣地。我軍轉進至新陣地後，日軍增援之第102、106、107、114、116等師團及台灣軍等部隊，陸續到達戰場，此時日軍總兵力已達20萬以上。

10月7日，日軍以第3、9兩師團在優勢砲兵火力支援下，由蘆藻濱北岸向國軍第8師正面黑大黃宅，及胡宗南正面之西亦房實施急迫渡河，國軍趁日軍半渡立足未穩時，多次逆擊殲滅日軍甚多。日軍決定以1個師團運用海軍輸具由杭州灣登陸，威脅國軍戰略的翼側。11月5日日軍在金山衛附近行廣正面登陸，擊破國軍守備部隊後繼向淞江前進，此時國軍在上海市周邊地區作戰之大軍側背受到日軍嚴重威脅，且誘迫日軍主力轉用華東地區的戰略目的已達到預期效果，戰區乃下令向吳、福之線轉進。

11月8日國軍奉戰區之命向吳、福之線轉進中，日軍初期行正面追擊，為國軍阻擊於崇德、舊館市、吳錫及江陰周邊，11日陳誠總司令第15及21集團軍掩護右翼軍轉進，13日京滬路方面日軍傾其第13、6、114、18、9等師團兵分六路，在其海、空軍協力下積極西進，國軍第7軍奉命警戒太湖西、南側地區，蔣公（兼任第3戰區司令）鑑於吳興、廣德地區重要，親令第7軍（轄第170、172師）向吳興挺進，並令新到川軍6個師向廣德急進以策應第7軍作戰，當時因戰線遼闊又受日軍海、空軍威脅，各部隊間指揮、管制、通信、聯絡不易，造成攻勢前進與向後轉進紊亂，川軍6個師於廣德方面遲滯日軍多日，待無錫、宜興等地國軍主力向南京轉進後，乃退至廣德以西山區，淞滬戰役到此結束^⑫。

肆、雙方綜合檢討

註^⑫，王立民著，前揭書，頁五十二至五十七。

一、 日軍：

(一)上下不一、貌合神離

日本自明治維新，天皇是君臨而非統治，輔弼機構在制度上無法有效控領指揮軍隊（自 1930 年到 1936 年止，有部份野心軍官秘密結社，準備使用武力改造政府，故造成濱口雄幸及犬養毅兩首相被刺殺，形成轟動一時的 226 事件，差點危及到日本天皇地位），此種以下犯上、上下不一、貌合神離之風盛行軍中，種下日軍侵華「速戰速決」戰略構想落空（日本參謀本部石原大將得知中蘇已簽互不侵犯條約，唯恐在淞滬地區消耗太多兵力將削弱對蘇軍戒備，乃有「不擴大」之戰略指導，但石原大將所提「不擴大」策略，使陸海、空、軍典型的「一擊」戰略思維進退維谷，甚至於淞滬戰役中造成「上下不一、貌合神離」的弊害。^⑬）

中級幹部思考不一，並漸而造成「下剋上」風氣瀰漫日本陸軍中，所以上海日軍不理會日本大本營「不擴大」大方針戰略指導，不能體會大本營意圖在國際法夾縫中玩弄「事件/事變」圖利的涵義（大本營認為全面擴大戰爭，將會導致國際強國干涉，違背其蠶食中國政策），乃發動淞滬戰役。但石原堅持不擴大方針，不同意陸軍投入本戰役，並聲明除非日本天皇下達旨意，否則不會增兵於淞滬地區，直至 7 月海軍陸戰隊盲目挑釁國軍，連遭我守軍痛擊陷於苦戰不利態勢，石原在各方面註^⑬，吳玉貴譯，《大本營陸軍部「大東亞」戰爭開戰經緯（五）》，（臺北：國防部史編局，民國八十年），頁四一一。

不滿意之下被迫去職，日本大本營為主戰軍官掌握後，改變「不擴大」初衷戰略構想，變為擴大戰爭指導^⑭。此種戰爭指導遷就當前臨時狀況，犯了「以不一定獲得之利，欲抵消極可能之害」，綜觀日軍在第一次淞滬戰役前侵華戰略構想，可稱為具有遠程戰略構想，但見其在第二次淞滬戰役中可發覺日軍欠缺整體戰略構想，所以戰後日本內閣重臣評道：「陸軍對淞滬事件，出兵上海就無計可施，使得狀況難以控制，那麼多軍隊出動後，一切都難以掌握，說什麼「不擴大」云云，已成了脫韁之駒，要訂國策也無從訂起，形成了只要軍隊想要作的事，什麼都做的出來的狀態^⑮」。此種以戰術指導戰略，戰略支持戰術，本末倒置之作戰指導，當然會造成師老無功，後雖能以一部於金山衛地區登陸，但由於國軍主力能適時主動向後轉進，造成日軍爾後軍事行動僅能作正面壓迫國軍，無法遂行其預定一翼包圍殲滅戰，致使其陷於無底深淵、師勞無功長期苦戰中。

(二)判斷錯誤、逐次用兵（參閱要圖四）

明治維新形成日軍強權霸道之特性，其國力雖強，但受軍國教育之誇張與矇騙，養成輕侮中國心理，且在七七事變之前，其在中國之將領誤認中國少數軍閥官僚為中華民國民族之代表，以為可以輕易收買或以武力迫使國軍屈服，故計畫以 10 個師團在華北地區擊滅國軍主力

註^⑭，黃仁宇著，《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》，（臺北：時報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），頁一九九。

註^⑮，謝鴻猷著，《蘆溝橋事變之海軍作戰指導》，（臺北：國防部史編局，民國八十年），頁四〇五。

兵團，另以一部在上海地區牽制我軍北上馳援，預期計畫在3個月內可結束戰爭。未料我各省將領齊擁中樞，皆抱定犧牲一切一致對外抗日，堅守抗戰守土之責任，為國家民族之興衰與日寇周旋，另日軍大本營發現淞滬戰役前敵情判斷錯誤，不得臨時策定計畫由本土及華北地區抽調9個師團投入上海地區，致使其侵華戰略構想「由北向南」作戰線，因上海淞滬戰役造成「由東向西」，變成溯長江西上陷入我以空間換時堅持久作戰的泥淖。

(三) 戰略不當、戰術錯誤

民國21年爆發第一次「八一三淞滬會戰」，國際間稱「中國事件」，日軍軍閥於本役後獲得其戰略利益之餘吹擂道：「在此一作戰中，一舉投入充分兵力，而迅速達成作戰目的，復乾淨俐落迅速撤兵^{①6}」。民國26年日本軍閥發動第二次淞滬戰役希望能故技重施，再次貫徹「北方攻擊、南方談判」鯨吞蠶食的政策，然由全程作戰經過可發覺日本大本營策定淞滬戰役計畫，未考量蔣中正先生由作戰軸線的任務分析，意圖將日軍「由北向南」作戰線，改為「由東向西」不利作戰線，仍一意環繞「不擴大」及「一擊」主題上，造成戰略無法指導戰術，戰術無法支持戰略之窘境。

8月20日國軍突入上海楊樹浦港以西，日軍海軍陸戰隊主力部隊陣地，準備圍殲陣地日海軍陸戰隊，迫使日軍臨時以增援部隊於23日對吳淞、寶山、川山口、瀏河口做多次無計畫突襲登陸，期能解除上海日軍將被殲滅之危機，並伺機能達到擊滅我第9集團軍主力部隊。然其

註^{①6}，曾清貴譯，前揭書，頁五〇二

戰爭、戰略、戰術三方面，由於上層次一再錯誤，造成基層幹部雖勇猛頑強亦難以彌補戰略錯誤，此戰略不當、戰術錯誤作戰指導，致使日本多次由華北地區及日本國內抽調馳援兵力達 30 餘萬，戰車 300 餘輛、戰機 200 餘架，各型艦艇達百餘艘，分批逐次投入支作戰方面（上海地區）。

當時美籍記者白修德（時代週刊）所撰專文道：「蔣委員他採取一項辦法，將日本人野心所構成的圓滑軍事政治體系拖垮，日本人希望北方打，到南方來談判，蔣選擇了一全民抗戰的辦法，引導敵人到長江下遊他自己的方寸之地應戰，這區域接近他的內部基地，他的部隊已在此集中待命^⑪」。由於日軍戰略不當、戰術錯誤，造成浴血苦戰達 4 個月之慘境，最後身陷中國戰場泥沼而不可自拔，終致蒙受戰敗慘局。故戰後蔣緯國將軍在「蔣委員長 中正先生抗日戰爭指導」中謂：「誘敵將其侵華作戰由北向南之作戰線，硬轉變為由東向西！這是抗日戰爭，我戰敗日軍之總關鍵-這是戰略關鍵^⑫」。

（四）窮兵黷武、兇暴殘忍（參閱要圖五）

日本於明治維新後，政治安定、吸收西方知識、工業技術、教育制度成為工商先進國家，1905 年戰勝俄國躍為世界巨強之一，由於在豐臣秀吉時「征服中國為征服

註^⑪，黃仁宇著，《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》，（臺北：

時報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），頁一七六。

註^⑫，蔣緯國著，《蔣委員長中正先生抗日全程戰爭指導》，

（臺北：中華戰略協會，民國八十四年），頁一〇六至一〇七。

世界之前奏」窮兵黷武思想深植軍中幹部腦海，故軍國主義興起形成大陸政策，逐步對中國發動侵略行動。民國 17 年強佔我濟南、19 年發動「九一八」事件進佔東北三省，21 年入侵上海，22 年進攻熱河，24 年侵佔察哈爾東北，25 年侵佔綏遠，26 發動蘆溝橋事件，這一連串侵略行動，日軍所到之處凶暴殘忍，姦擄燒殺隨之而來，侵佔東北三省就實施「三光」政策，到處「燒光」、「殺光」、「搶光」，並驅使我同胞在佔領區或赴日本做奴工，病弱者即以屠殺或投入「萬人坑」，另在哈爾濱設立「醫學實驗室」，任意捉補我國民做細菌、化學實驗的對象。

淞滬戰役時日軍教制令明文規定，看到任何中國人（不分軍、民、男、女、老、幼）一律擊斃或刺死，淞滬戰役後日軍攻入南京，更變本加厲對我軍民以機槍掃射，集體射死或刺死，甚至以武士刀進行「砍斬百人」比賽，有的官兵以步槍刺刀挑著我同胞的人頭，在街上高歌喜笑，日軍「南京」大屠殺、史料甚多，尚可統計描述，其他戰區及全國，史料缺乏難以記載，但由此可見一斑，日軍「窮兵黷武、兇暴殘忍」的行為，造成淞滬戰役時全國軍民大家，抱定為國奮鬥犧牲與敵殊死，人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戰鬥期間我三軍官兵置個人死生於度外，予以擁有三軍絕對優勢的日軍重大傷亡。日本不瞭解「兵兇戰危」之精義，執意「窮兵黷武」最後當然會玉石俱焚「無條件」投降的下場，人民則成了陪葬的彩俑。

二、國軍

(一) 高瞻遠矚、掌握勝算

抗日戰爭爆發之前，日軍在「九一八」侵略我東北三省之後，接著又在淞滬和長城地區進行各種武裝侵略，當時一般不明國際形勢（英國正忙於應付德國不暇東顧，美國則採取孤立主義，只重視在華美僑的利益，而蘇聯更是別有用心，乘機作壁上觀望，我國向國聯做出控訴與抗議日軍侵略行動，仍未使國聯能迅速做出有效制止），雙方戰力懸殊甚巨（日本師團戰力可與我國編裝完整的3個師對抗，其海軍僅次於英、美兩國，居世界第三位），國人只憑藉一股熱血就不明事理高呼對日抗戰，甚至有一些別有居心的奸賊，假借抗日之名從事反抗、挑撥中央政府之實。

蔣中正先生深知中國目前戰力尚不能與日本對抗，此時不應該不顧國家之安危，貿然付之一戰，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，因此，由「五三慘案」至「七七事變」間，先後與日軍簽訂「淞滬停戰協定」、「塘沽協定」、「何梅協定」、「秦士協定」等等，為國家爭取寶貴備戰的時間，若非西安事變，日本軍閥見到中國人不分性別、年齡、職業和地域，一致對蔣公衷心擁戴，唯恐在蔣委員長長假以時日加強「建軍備戰」，爾後要想征服中國必困難重重，故因而提前發動戰爭，若非如此，以我國當時國力發展速度估計，屆時非但日軍必然知難而止，不敢再對中國侵略，而且我國必然收復東北，然日本雖提早發動戰爭，但蔣中正先生以「忍辱負重」換得9年戰爭準備時間，掌握可勝持久的契機。

（二）改變戰線、開創勝機（要圖四）

戰略之為藝術，就看能否即時創造有利狀況，並加以

發展與運用而達到預期之目標，所以中日戰爭之勝負關鍵，就在日軍之能否「速戰速決」，或中國軍隊如何來達成「持久」作戰目的，在雙方優劣形式轉移時，斷然轉移攻勢殲滅對方，這個理論看似非常容易理解，但是要把理論化為行動，若不是具有高度軍事素養的戰略家，亦非常難以如願以償。

「七七事變」日軍逼使國軍走向「決戰」最後關頭，蔣中正先生於民國 26 年 7 月 14 日向世界嚴正表示：「我們只有犧牲到底，抗戰到底」，28 日至 30 日，日軍先後佔領北平和天津，這是蔣委員長早在意料中之事，為使日軍對中國用兵無法抄襲元、清歷史路線，迫使日軍更改作戰線「由北向南」變為沿長江「自東向西」的不利作戰線，乃令湯恩伯率第 13 軍及 17 軍向南口作戰，又令衛立煌率第 14 集團軍支援南口作戰，遲滯威脅佔據北平日軍不敢斷然向南運動，蔣中正先生鑑於北翼威脅不大後，才先後投入國軍有力之一部於淞滬戰場內與日軍爭奪戰，迫使日軍誤判國軍精銳部隊已投入上海地區，在求「速戰速決」心切之下，更改原作戰計畫將主作戰線由華北轉移至華中（日本將中國戰區區分為華北、華中、華南，上海地區日軍稱為華中戰區）。

蔣委員長華北的「阻」及淞滬之「誘」戰爭指導，主在粉碎日軍「速戰速決」戰略構想（國軍如由北向南行持久作戰，日軍一可充分運用其海、空軍優勢兵力，支援其地面部隊作戰，二可輕易封鎖國軍補給線；三可迫使國軍補給線與作戰正面呈平行不利態勢，四若武漢為日軍攻佔，將會造成國軍背海一戰；若日軍作戰線由

東向西，它的作戰線將改為由平津上海-南京徐州-武漢，較其原來由北向南沿平漢鐵路攻略武漢距離較遠，況且它只能壓迫國軍向西轉進至大後方，無法迫國軍決戰），故本役後日軍在國軍「以空間換時間」，無法有效執行「速戰速決」原計畫，種下其進退兩難之難境。

(三)物力遷移、厚植戰力

以空間換取時間，乃是國軍抗戰持久作戰成功的憑藉，因此，就空間而言淞滬戰役的導發，迫使日軍作戰線改由上海向漢口前，經過 1080 公里的空間整取 14 個月寶貴時間，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，使大陸東南沿海及長江下游的重工業設施（生產工廠有 400 餘家，其中包含鋼鐵、機械、電器、化學、紡織、食品、教育用品等，機械與原料約 6 萬 3 千餘噸），以及佔全國四分之一的熟練工業人才、政經與教育人員約共 1 萬 1 千餘人，能從容向後方轉進，有了這些人力（智力、工技）、物力（工業設備），對於爾後抗日戰爭大後方基地建設有極大影響。所以蔣委員長戰後曾說：「應遷移之物品，皆能如期如數運完，若早 10 天前轉進，則爾後抗日大局必不堪設想」，由此可見淞滬戰役指導主在創爾後抗日獲勝主要戰役。

(四)振奮士氣、英勇抗戰

八年抗戰我中華民族是被迫應戰，雖然在當時我國的有形戰力遠不如日軍，但我擁有廣大國土與民眾及悠久歷史文化，故在有、無形戰爭潛力均較日軍有利。民國 17 年日軍出兵濟南造成「五三慘案」之時，我政府為謀得生聚教訓所需準備抗戰時間，故忍痛應允日本多次的

無理要求，尤以「塘沽協定」政府需用極大勇氣方能簽訂，承認日軍在華北地區特殊待遇，事實上我國爭取了4年充實國力的備戰時間。

民國23年2月19日蔣中正先生在南昌發起「新生活運動」，將中國傳統道德「禮、義、廉、恥」四維表現於衣、食、住、行的日常生活中，培養國民「明禮義、知廉恥、責任、守紀律」的情操，此一振興四維八德的民族精神運動，革新國民生活，提高國民素質，增強抗日禦侮精神戰力。日本此時不乏有識之士，如阿部信演說「中國問題」議題，提出日軍判斷中國人「支那無民族精神」、「缺乏愛國心」、「不堪一擊」等宣導已不正確，甚至日本大本營第一部部長（主管作戰）石原莞爾駁斥中國「新生活」運動不是排日運動，亦不是中國人五分鐘運動，此為中國人洗雪國恥，團結合作的運動，惜此真知灼見為多數目光短淺日、妄自尊大的日本軍閥譏諷不重視，一意妄圖以武力蠶食中國。

「七七事變」後，蔣委員長於7月19日發表「最後關頭」講演，復於31日發表「告抗戰全體將士」演講，宣稱：「現在既然和平絕望，只有抗戰到底，那就必須舉國一致，不惜犧牲和日寇死拼」，蔣委員長的演說獲得全國軍民與社會輿論全力支持，是以在淞滬戰役中不僅三軍官兵英勇抗敵（陸軍參戰部隊達50餘師、砲兵5個團，在正面200餘公里、縱深300餘公里的淞滬地區作戰，全體官兵前仆後繼的鬥志、同仇敵愾的精神，驚天地、泣鬼神，浴血奮戰、英勇抵抗；海軍以快艇多艘四出突襲日艦，造成日旗艦、戰艦、運輸艦重創；空軍小群多

路多次出擊日軍地面據點、船艦、戰機，創下「八一四」空軍光榮戰史，擊落日機甚多架，甚至隊員沈崇曜等座機故障，乃加足油門衝向白龍港日巡洋艦與艦同歸於盡、壯烈成仁）。尤其謝晉元團長率 800 名戰士在日軍四面合圍之下，寧願壯烈成仁，不願貪生怕死，孤軍死守四行倉庫，震驚全球令英國泰晤士報報導；「上海十週血戰、、、華軍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^{①9}」，由於全國軍民有不畏艱難險阻，不受威脅利誘的抗戰精神，故能由淞滬一役中滋長戰力，故能獲得最後勝利。

（五）、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

「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」是國軍因應日軍最佳戰法，國武器裝備不如日軍，無法與其進行大規模對壘消耗戰，因此國軍將主力採「化整為零」、「以小博大」的戰法，「寓兵為民」與日軍進行作戰。由於「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」屬於一種低度戰爭，卻能發揮高度戰略戰術之作戰藝術，它具有異於一般正規作戰的特質，是以「間接路線」中的一種重要手段，用來達成某種戰略所率定的目標。淞滬戰役 8 月 13 日我國軍第 87 師、第 88 師以利用兵民合一、沒有戰線以「間接路線」進攻佔領滬江大學、持志大學、八字橋等要點，使滬西豐田紗場日軍在心理上和物理上喪失平衡驚惶向後撤退，18 日日軍投入大量陸戰隊增援，我軍不畏敵優勢三軍火力，「以面制點」、「以面制線」枯竭日軍生存發展的泉源，使其處處陷於孤立，另一方面以全軍、民之情報、作戰、警戒的戰爭面，即時動悉日軍大批艦隊正分批運輸其後續兵力於吳淞口、

註^{①9}，王立民著，前揭書，頁六十。

獅子林地區準備登陸。統帥部立即轉移工事重點指向吳淞口方面，這種「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」特質是避開牛角而把劍刺在牛背和頸部。

淞滬會戰期間，我國軍將領深深領悟到蔣委員長所說「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」的特質，國軍於「一二八戰役」後利用戰爭面之掩護，秘密構築據點工事，囤儲械彈彈藥及各類補給品，將淞滬戰區後備軍人納入戰鬥編組，以「城」為單元、「鎮」為基礎、「鄉」、「村」為細胞，在「橫」方面、實施村村聯防、鄉鄉會剿，在「縱」方面、村自衛、鄉支援：鄉自衛、鎮支援：鎮自衛、城支援，發揮全民作戰體制功能，使整個戰場產生詭異千變萬化，戰鬥期間國軍突襲、襲擊、伏擊、襲擾、破壞等行動，使日軍於淞滬戰役初期頭痛而陷於精疲力竭、處處受限，有力無處使、陷於被動挨打，造成造成全般態勢不利。故日軍大本營將準備使用華北戰場精銳部隊，逐次抽調淞滬地區，後又感於兵力不足難以應付國軍「化整為零、以弱敵強」的戰法，乃又從本土抽調增援部隊馳援。本役後日人伊藤正德在「日本軍血戰史」一書中一語道破：「中國軍於淞滬事件中在百姓支持下，已富有韌性，以退為進、小群多路戰、、、這種現象有如我們進店裏時，因門簾過長，反而全身被門簾所遮蓋，是危險無比，尤其中國後方寬廣，深度又長，因此日軍在淞滬戰場上打到哪裡就會黏在那裡，結果將變成進退維谷，動彈不得的局面。②〇」

註②〇，伊藤正德著、蔡茂豐譯，《日本軍血戰史-進攻篇》，（臺南：大漢出版社，民國五十七年），頁二二六。

(六) 訓練精良、士氣高昂

兵者、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、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戰爭非等兒戲、戰前各項訓練作為攸關戰爭的勝負，其中部隊模擬戰地的臨戰嚴格訓練最為重要。淞滬戰役前在秣馬厲兵階段，國軍士氣高昂，加強戰地各項臨戰的訓練，官兵由上級訓令充分瞭解本役「為誰而戰、為何而戰」，大家士飽馬騰、摩拳擦掌勤於訓練戰術、戰鬥及戰技專業領域，參戰官兵尚加強「體力」、「膽識」、「毅力」等訓練，以適應戰場惡劣環境之考驗（練兵口號是「鐵腳夜眼，敵人喪膽」，平日要求官兵，白天打靶，夜間瞄香頭，並經常練習越野賽跑、武裝渡河、搶山頭、佔陣地、翻牆、爬城、劈刺、木馬雙槓、挖戰壕，並多在暴風雨夜練習「鐵腳夜眼」，揸機槍搶山頂、奪陣地，巷戰、白刃戰，總之日軍會的國軍必須儘力超敵人水準）。故本役敵我戰力相差甚句，國軍與日軍作戰是寸土必爭、浴血奮戰，個個士氣高昂，軍心堅如鐵石，陷陣之勇、死事之烈，可驚天動地、泣鬼神，官兵以熱血犧牲屢挫日軍最後達成戰爭目標，迫使日軍更改作戰線。

(七) 從容自持、死中求生

第二次淞滬戰役發生後，由中日戰史中可發現沒有一次會戰如此驚天動地、扣人心弦，日本動用現代化海軍艦艇、艦砲、空軍戰轟機、陸軍坦克、大砲、毒氣等均大量上場，國軍除了槍砲外，以最原始面對面刺刀格鬥，大刀劈殺，及壯烈的人肉炸彈也頻頻用於戰場內，應付日軍戰車蹂躪，我國軍官沒有現代化武器，只有眾多身軀成為抗拒日軍的唯一長城，在戰場上常耳聞我國

軍官兵高唱：「起來，不願作奴隸的人們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的長城、」。

本役參戰官兵均瞭解「小我」實寄託於大我之中，祇有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個人的生命價值才能發揮到極致，一個人一定要先能領悟出此一「天人合一」的生死觀後，才能掌握個人生命的取捨，進而心存浩然之氣，也才能臨大節而不變，當大難而不苟，視生死而如歸。所以 8 月 17 日空戰時我飛行員閔海文為敵高砲擊落，跳傘時誤落日軍陣地，閔員舉槍擊斃敵軍數名後，以最後一顆子彈自戕成仁；海軍僅有少許英式落後快艇（速度之慢應稱慢艇），面對日本現代化海軍作戰，如飛蛾撲燈，但我海軍官兵均有「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朽之根基」，及「我生則國死，我死則國生」觀念，8 月 14 日以運輸艦沉塞河道，並在日艦嚴密監控下完成黃埔江三道佈雷封鎖，8 月 16、25、28 日及 11 月 11、12 等日以快艇多次出擊，重創日旗艦出雲號、鐵甲駁船 4 艘、小火輪船 2 艘；陸軍官兵均能貫徹 蔣公強調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戰爭哲學，看透個人的生死，以「大我」的生命為出發，追求國家與民族的永生，令國際友人對國軍為之敬仰、稱讚。

伍、經驗啟示

一、將帥韜略、運籌作幄

用兵是一種藝術，必須巧妙運用「判斷力」與「想像力」，「判斷力」使想像力循正軌發展，「想像力」則使判斷力得以啟發與開導。故「運籌作幄、掌握先機」的判斷力與想像力，實乃作戰致勝主要因素。然戰爭是敵我

雙方自由意志的活動領域，戰場景況也常因主、客觀因素不斷變動，有為指揮官對戰爭事態的發展，僅能依據現有狀況與以往經驗，作蓋然性的推斷，尋求其最佳行動，以為指導戰爭之準據，也可以說戰爭事態的發展，在客觀性質上是遵循蓋然性的法則，運用野戰兵力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軍事野略之藝術。

但因戰爭事態附加了偶然性，增加戰爭本體複雜面貌，戰場上某一偶然性戰術行動將會影響戰局，故具有韜略指揮官必發揮其高度智力發揮戰爭藝術化的效能（察知戰機，掌握戰機）及極致（創造戰機，改造戰機），使蓋然性事態接近必然性發展，改變敵我優劣的形勢，方有機創造增進成功公算及勝利之機率。由此可知「謀略」為古今作戰中指揮官常用的策略，亦為東、西方軍事指揮官掌握戰局的鬥智作為，此種「將帥韜略、運籌作幄」作為，基本上脫離不了「虛」、「實」、「真」、「假」這四個字變化，這四者關係，恰如斧、刃有斬斷之功能，若斧、刃無柄則斧、刃也難揮其力量。

民國 21 年日本軍閥發動「128 淞滬會戰」，中共乘機向湘、浙、閩、贛、豫、鄂、皖地區滲透，我政府內憂外患、腹背受敵、內外夾擊，蔣委員長為改變內外受敵之不利戰略形式，決策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先剿滅國內叛亂之共軍，至第四次圍剿時日軍見「中共、日本聯合戰線」將遭個個擊破時，有兔死狐悲之感，乃以多次軍行行動阻擾國軍剿匪行動。蔣委員長為貫徹「攘外必先安內」國策，定「虛」方面於令何應欽與日本簽「何梅協定」，將我華北晉、冀、魯、察、綏五省特殊化，並令

宋哲元與日軍週旋，爭取國軍剿匪與備戰時間，國軍方能從「虛」到「實」，從「無」到「有」建立淞滬戰役三軍應戰的籌碼。爾後蔣委員長洞察日軍「三月亡華」的企圖，以「示假隱真」、「以真示真」巧用「實而虛之」、「虛而實之」的謀略，曾經多次迷惑日軍統帥部，由於日軍將帥韜略、運籌作幄內涵不足，未能瞭解孫子所說「詭道」就是謀略，它必須「詭詐出奇」，詐而不奇只是流氓敲詐行為，更談不到謀略，所以四個月淞滬喋血奮戰，改變日軍作戰線開創爾後抗戰有利態勢，奠定長期抗戰勝利之基礎，塑造日本面臨亡國之命運。

中共在波灣戰爭之後，體認到高科技局部戰爭將是未來戰爭的主流型態，依其「不對稱作戰」思維與軍備發展狀態，共軍犯台行動必然是朝向以「損小、效高、速決」為最高目標，積極發展戰術(M族)及巡弋等飛彈。但隨著國際主、客觀環境的變化，共軍為防止台海一旦開戰後，美軍或其他外國勢力介入可能發生的國際法或國際公約問題，乃提出「反分裂國家法」，企圖達到「先法後兵」、「兵以法行」、「兵止法進」^②等三個目標，以求得「名正言順」的軍事行動。

註②，「先法後兵」：在將來面對其他干預統一的外國勢力，可以國際法上的充分理由，斷然採取軍事行動予以制止；「兵以法行」：如果必須「武力」完成統一大業時，可藉「反分裂法」向全世界各國宣傳其使用武力合法性；「兵止法進」：利用武裝衝突爭取軍事行動在政治上的主動權，適時適切以法律形式將軍事上的勝利，轉化成國家統一的政治事實，彰顯中共武力犯台軍事行動的「名正言順」的合法性。資料來源：蓋新奇、李玉平《打贏高科技戰爭的戰爭法思考》，(西安政治學學報：第13卷第1期，二〇〇〇年二月)，頁五一。

中共此次提出「反分裂國家法」將謀台之企圖訂在法律條文中，可發覺其對台戰略上「文攻武嚇」兼施，戰術上「軟硬兩手」並用，法理上「反分裂國家法」揮牙棒、施蘿蔔。所以歐洲 CNN 及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從北京發出新聞稿均強調：「反分裂法是戰爭準備法」、「中國大幅度增加軍費，預判將會對台灣發動斬首戰爭」，美國華盛頓時報指出：「中國人大會《橡皮圖章》似通過反分裂法，透過立法威脅武力犯台^{②③}。」

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雖然多次解釋：「這是一部加強與推進兩岸關係，一部和平統一的法律，不是一部戰爭法^{②④}」，並引用史記淮南恆山列傳第五十八：孝文 12 年，民有作歌，歌淮南厲王曰：「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粟尚可舂，兄弟兩人不能相容。」感性對台灣說：「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，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，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」。溫家寶習慣在中外記者會引用「史記」感性開場，2003 年引用于右任的「望我故鄉」談統一，2004 年引用邱逢甲的「懷念故鄉」，對照這三年溫家寶用語，可發覺其用「兄弟不能相容」詞句，來形容兩岸面臨危機和挑戰更為嚴峻。

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，國軍將校幹部應發揮「將帥韜略、運籌作幄」，借鑑第二次「淞滬會戰」及波灣戰爭的戰史諸經驗，認清當前主、客觀形勢，前瞻未來勾

註^{②②}，中央社/日內瓦報導，《反分裂法是戰爭準備法》，（台北：中華日報第十六版，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）。

註^{②③}，中華日報綜合報導，《溫家寶：非戰爭法》，（台北：中華報第一版，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）。

繪反制中共武力犯台的之願景，發揮其高度智力發揮戰爭藝術化的效能（察知戰機，掌握戰機）及極致（創造戰機，改造戰機，以因應當前敵情的潛在威脅，並為未來的戰爭及早做好周全之準備，建立有恃無恐之戰力，此方為「全軍、破敵」之道。

二、建立嚇阻、導彈部隊

建軍理論是一個國家基於國家目標，立國條件、國際情勢、國防需要、傳統文化、地略形勢、物質及技術條件等主、客觀因素，在建軍及用兵上建立的觀念與主張，其完整適切與否？關係戰爭成敗、影響國家存亡。十八世紀中葉，普魯士王菲特烈二世改變了當時歐洲城邦時期傳承「以態勢取勝、避免決戰」的觀念，改採「會戰殲滅」軍事理論，倡導以「徵兵制」代替「傭兵制」贏得普奧「七年戰爭」勝利中國滿清自鴉片戰爭後，開始進行軍隊、武器現代化革命，於一八六〇年建立軍事工業、仿造歐美洋槍大砲建軍備戰，然迫切需要現代化「軍事理論」卻延遲經「甲午戰爭」與「八國聯軍」之役後。至十九世紀末葉才認真檢討外國軍事理論及部隊訓練方法^④，此六十年軍事理論建立的遲誤^⑤，為清廷爾後一連串對外戰爭失敗、民族自尊受到羞辱之主因。綜觀上述可知戰略構想必須與建軍備戰相契合，否則僅有前者而無後者，則成為有目的而無行動之空談妄想，若僅有

註④，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史綱一北洋六鎮的建立》，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），一九八〇年，頁三六至六六。

註⑤，轉引自田震亞著，《中國近代軍事思想》，（台灣商務印書館）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，頁一二〇至一二二。

後者而無前者，則成為有行動而無目的之亂打妄動。

第二次波灣戰爭伊軍近十年雖受武器禁運條約限制，但其砲兵部隊仍擁有數千門各式火砲及多管火箭與戰術飛彈，但海珊不重視伊國長程地對地飛彈發展，只重視「防衛固守」作為，欠缺「有效嚇阻」戰略構想，結果此舉造成本役任由美軍，以外科手術作三軍之先鋒，佐以遠程精準武器癱瘓伊軍耳目後，再以精銳地面部隊及砲兵火力支援單位，遂行南北夾擊、左右包抄，壓縮包圍圈、分割擊滅的城鎮作戰。反觀伊軍「採戰略持久」，初期保存戰力避免決戰，竭力遲滯聯軍攻勢行動；爾後逐次收縮戰線，集中戰力於巴格達週邊地區，誘敵主力進入巴格達行持久城鎮作戰，逐次消耗、削弱敵軍並利用國際媒體擴大宣傳平民傷亡，期藉輿論壓力迫使聯軍停戰」的戰略構想，因欠缺有效嚇阻武器，故難達成上述戰略目的。

我國戰略構想為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，防衛固守國軍已實行多年戰場經營，幹部對此已有正確認知，然在「有效嚇阻」方面武器，對中共而言台灣有何武器對其武力犯台有嚇阻作用，至今仍無著落。就我國聯合登陸指導作戰，係依「拒敵於彼岸、擊敵於海上、毀敵於水際、殲敵於陣地內」實施，其中前兩項是由我國海、空軍負責主導，陸軍負責主導後兩項，然就中共武力犯來過程而言，其循「制空、制海、電磁權、登陸」四個過程，共軍必須確實掌握三權後，其登陸進犯部隊才會於對岸港口集結，上船航渡實施「正規」及「非正規」登陸作戰，故我「拒敵於彼岸、擊敵於海上」過程，此

時已無足夠海、空軍可遂行反登陸作戰能力（海空軍主力早已執行空、海戰完畢），此時為共軍戰力最為脆弱時（其登陸部隊擁擠於登陸船隻上，戰力等於零、無法發揮戰鬥效能），我砲兵若無發展地對地導彈，就火砲及多管火箭射程限制，僅能執行「毀敵水際」、「殲敵於陣內」反登陸作戰，完全未能掌握敵登陸部隊脆弱時予以致命一擊（敵登陸部隊全在船上，此時期戰力受限船隻無法發揮戰力），基此我相關科技單位配合國防部，應積極研發射程超過 500 公里「地對地導彈」，若研發成功便可執行「拒敵於彼岸、擊敵於海上、毀敵於水際、殲敵於陣地內」反登陸作戰四個階段，落實我國「有效嚇阻」戰略構想。

三、經營戰場、保存戰力

戰爭發起的最高藝術，就是要達到全軍破敵，「全軍」最重要手段是不讓敵人偵知我之所在，使敵的武器系統無從發起攻擊，波灣戰爭是非直線戰爭的型態，海珊戰前多次要求伊軍幹部研讀蔣公於淞滬戰役中所說「消耗」、「疲困」、「進退維谷」、「長期戰」、「泥沼」等策略，並準對第一次波灣戰爭及科索沃、索馬利亞、沙漠之狐等戰爭中，吸收值得伊軍戰場經營與戰力保存經驗教訓。綜觀其「全軍」作為將戰力藏於九地之下，工事構築沿巴格達城、內外完成地下化，砲兵所屬之火砲、觀測所、射擊指揮所、通信設施、彈藥後勤設施等掩體，依地形規劃裝備、武器分散隱蔽於山洞、涵洞、橋樑、隧道、坑道、壕溝、堅固建築物、地下室、大樓間隙、高大建物側方道路及起伏之地形中，或化整為零混雜於

住宅區、寺廟、醫院、學校等民用設施附近，力求深入地下 30 至 50 英尺下，可抵抗 500 磅炸藥之爆炸威力。

然環顧戰史我們可發覺「破敵」的首要在於明敵，主在藉各種偵蒐機制使戰爭透明化、令敵人裝備無處可躲，美軍於波灣戰爭中運用數位化系統使得戰場「可預期」與「不預期」因素產生革命性提升，藉「科技之整合」將「殺傷力」及「高速機動力」大幅提昇，「無層級」與「網狀指揮」，將不確定及模糊性戰爭之霧透明化，運用速位化區域網路、快速有效處理使情報傳遞、戰鬥節奏與安全管制同步實施，掌握敵情發揮「全軍」與「破敵」之效。然由戰爭過程可窺出美、英聯軍運用數千至近萬發枚精準導引炸彈，對巴格達、巴斯拉、阿馬拉、摩蘇爾、吉爾庫克及提克里特進行密集海、空轟炸與攻擊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，可知伊軍經營戰場、保存戰力，有一定功效。

國軍戰備整備向以戰場經營為重心，使訓練與戰備、生活與戰鬥凝為一體，為求落實戰備工作，每年藉多種演訓驗證時效，採分區驗收、縱向測考，以發掘問題、追蹤考核、務求落實，然國軍銳意推動戰備整備，就作戰要旨不外乎「全軍」、「破敵」兩種，以本校兵科特性、火炮於「全軍」角度、如何將砲、觀、射、測、通、彈、補等設施，將戰力藏於九地之下作為（包含工事掩體之抗力、指、管、通、情系統之地下化，軍品彈藥補給存量與品質維護、保養），「破敵」角度、如何乘敵登陸初期，立足未穩、戰力增長不足之際，發揮我砲兵彈無虛發之精度，一砲彈摧毀一目標之要求，摧毀登陸之敵軍

增長戰力之企圖，此為我砲兵當前戰備整備重要工作。

四、全民國防、戰勝憑藉

人類為了生存不論是侵吞或保護資源，就有武力的組成與戰爭之發生，戰爭大則滅亡國家民族，小則社會瘡痍滿面，若干年難以復甦；尤其無形的破壞力，摧毀倫理道德之堤防，造成心理變態，人慾橫流，法紀蕩然，而其破壞力更大、更廣。故孫子強調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^{②⑥}」；老子云：「兵者不祥之器……不得已而用之^{②⑦}」；孟子云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……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^{②⑧}」，以上所揭示國史書所載「慎戰」之片鱗隻爪，然而自有人類以來，即有戰爭存在；自有歷史以來，即有戰爭記錄。如是，人類不能避免戰爭為鐵之事實，各國兵學家不遺餘力研析人類戰爭史中發現，主導戰爭及運用與控制戰爭工具是「人」，精神戰力在中外歷史中扮演著戰爭勝負之關鍵，所以普魯士兵學家克勞賽維茨所著的「戰爭論」，在其書中有一半即是在論述戰爭與政治的關係，克勞賽維茨常引用之名言：「戰爭不過是政策(治)用其他手段的延續」，「戰爭永遠是手段，政治才是目的」，「戰爭不過是一個大規模決鬥，最後仍然是一種意志力的決

註^{②⑥}，李裕日編譯，《孫子兵法研究》，(台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)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，頁一。

註^{②⑦}，謝冰瑩編譯，《新譯四書讀本》，(台北：三民書局)，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，頁三〇三。

註^{②⑧}，紐先鍾譯，《戰爭論精華》，(台北：麥田出版社)，中華民國八十五年，頁二十。

鬥^{②⑨}」，由其上述可知戰爭目的屈服敵人意志。然戰鬥之過程是一種極具暴力、破壞及殘忍之性質，除了將暴力、破壞、殘忍加諸於敵人外，為了達成戰爭目標，更須為抵抗敵人之暴力、殘忍、破壞而蒙受犧牲，捐棄生命，這種成仁取義的精神與堅強意志力，非有賴於思想意識來激發，鼓舞軍人的靈覺感性，才能做到犧牲小我，進而為大我來犧牲奮鬥，其中關鍵就在於如何讓戰鬥中之軍人，全軍上下都知道「為何而戰，為誰而戰」，此激發意志之途徑，唯賴政治作戰發揮思想價值信念。

第二次美伊戰爭、美國以戰力為導向的兵力整建，充分顯現出高科技在戰爭中的時代價值，而英美聯軍的資訊優勢，精準打擊的接戰能力，全時戰場監控及高度聯合作戰效能，使得伊拉克部隊幾乎無招架之力，從雙方所掌握的科技水準可以獲得明顯的對比。但是有了高科技武器條件，並非就此抹煞了無形精神戰力的重要性，觀諸美伊開戰之前、美軍戰開後備軍人動員遠赴波灣進行部署，但長期戰備狀況及艱困生活環境，似乎並未磨損其堅定的戰志，與決心求勝的驅策力，相反地、我們從美國國民服從動員令慷慨踏上征途，以及眷屬送行打氣的表現，就不能不對美國人民強烈的愛國心刮目相看。據報載、波灣美軍獲悉布希下達作戰命令，人人士氣高昂、戰志昂揚，一位出海長達8個多月的美國航空母艦林肯號年輕水兵興奮的表示：「我們趕快攻打他們，打贏後就可以回家了」，美軍開戰後攤在他們前面是戰爭

註^{②⑨}，蔣中正著，《建軍事業要從頭做起》，（台北：總統 蔣公言行言論總集），卷二十八，頁九。

不可避免的死傷，惡劣天候與巷戰、生化武器及人肉炸彈等各種不確定的凶險，美軍為維護其國家利益、義無反顧堅定求勝的意志，為美軍戰無不勝之主因。

反觀海珊面對美軍高科技戰爭之威脅，海珊以抵抗侵略、號召聖戰為名、鼓舞戰志，並希望透過有效動員從事全民對抗英美軍隊的戰爭，此種精神動員於戰爭初期，確實對英美聯軍產生某種嚇阻作用，伊軍騷擾、襲擾、詐降與頑抗，以及人民自願擔任人肉盾牌，使得聯軍用兵顧慮增加、軍事行動受到遲滯，影響聯軍進展速度、陷於長期作戰泥沼中，後因美軍揭露海珊行宮奢侈腐化生活及殘暴漁民的政策，使伊國人民不願為海珊效命，共和衛隊與野戰部隊因海珊認知「忠貞」不同，雙方福利有相當不同差異，加之軍隊更因缺乏「守土護民」中心思想，隨戰爭進展伊拉克部隊內部出現抗戰意志的羸弱與忠貞氣節的消退，面對英美聯軍攻勢進展順利，伊軍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無組織、無效果，雜亂無章、一盤散沙、四處潰逃的現象。

由此可知，伊拉克本身雖有全民皆兵、全國動員的組織，但卻乏團結鞏固的抗敵抑制與有效動員組織和動員整被的執行能力，以至空有理想而無罰付諸實現，人民對英美聯軍的入侵雖極為反感，但欠缺「全民國防」政策，無法有效動員轉化為軍事作戰的支撐或實際的戰鬥力量，這種徒有「民力」而無法運用的情況，成為其全民皆兵構想中最大的敗筆，基此教訓、我國應加強「全民國防」政策，建立國人國防意識與正確認知，並透過綿密的計畫、組織、落實經常性的演練，藉以養成確實

的執行能力，使全民習於平戰合一的作法，以有效將「民力化為戰力，用民力支援戰力」，構成「全民國防」有效戰爭面，使對岸窮兵黷武中共不敢輕啟戰端，「前車覆、後車鑑」伊拉克血的經驗教訓，是我國最好的歷史教材。

陸、結論

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曾說：「戰爭是為屈服敵人，實現自己意志，所使用的暴力行為，戰爭不僅為一種政治行動，實亦為一種政治的工具，惟係以其他手段，繼續政治的對外關係而已^{③①}」。英國國際法學家歐本海默和賴特巴赫合著「國際法」描述有關戰爭：「國際政治中的對戰爭的界定：當國與國之間的意見衝突，達到雙方訴諸武力之際，或其中一方使用暴力，而另一方則認為此種暴力行為即和平之破壞，戰爭之關係因此而發生，在此種戰爭中，與交戰雙方均可使用有節制之暴力，彼此對抗，直至其中一方被迫接受敵對一方所願開列之條件為止^{③②}」。綜合上述所論可以確定戰爭是歷史進化中的常態，它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，其中「暴力行為」幾乎成了中共軍事學家用兵的金科玉律。

臺海兩岸的現況是由民國 38 年國共內戰延續下來，兩岸受臺灣海峽隔離，儘管雙方同文同種，但基於主義民主、共產）不同各自發展不同政經體制、生活言行、人生目標、價值取向、思考模式等。中共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

註^{③①}，克勞塞維茲，《戰爭論》，（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一九九一年），頁七十三。

註^{③②}，洪丁福，《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際》，（臺北：啟英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五月），頁七十五。

的一部份，故其謀台基本方針由初期毛澤東的「武力解放臺灣」，至鄧小平的「一國兩制」與江澤民的「一中原則」，再至溫家寶的「反分裂國家法」，其內容雖多次修正，但精神上仍不脫離「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」，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統一臺灣」；堅決反對「臺灣獨立」、「兩國中國」、「一中一臺」等分裂國家的圖謀和言行，由此顯見，中共統一臺灣的決心與立場，是堅定而不容置疑。

所以江澤明才會在多次重大會議中表達：「在臺灣問題上，中共沒有那個領導人，敢於無原則的妥協，因為那會使其成為歷史上的罪人。^{③②}」由於中共歷屆的領導人軍認為「臺灣問題」是關主權意識及民族主義的原則或立足點，碰其底線是不可商量的、是不惜玉石俱焚的問題^{③③}，可以了解這種原則問題是中共基本的立場。1996年美國介入臺海爭紛，使中共戰爭觀產生根本性改變，共軍檢證第一次波灣戰爭、科索沃戰爭、九一一事件、第二次波灣戰爭，調整其新的戰略思維與發展，其「深化科技練兵」作為，致使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羅德說：「中共近期軍演並不尋常，...五角大廈密切關注這次演習我們也會從中學習到東西^{③④}」，中共中央軍委會前副主席張震也指出：「訓練要以美國為對手，提高難度，能應付美國，對付臺灣就不話

註^{③②}，宋強等人著，《中國可以說不》，（北京：中華工商連湖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72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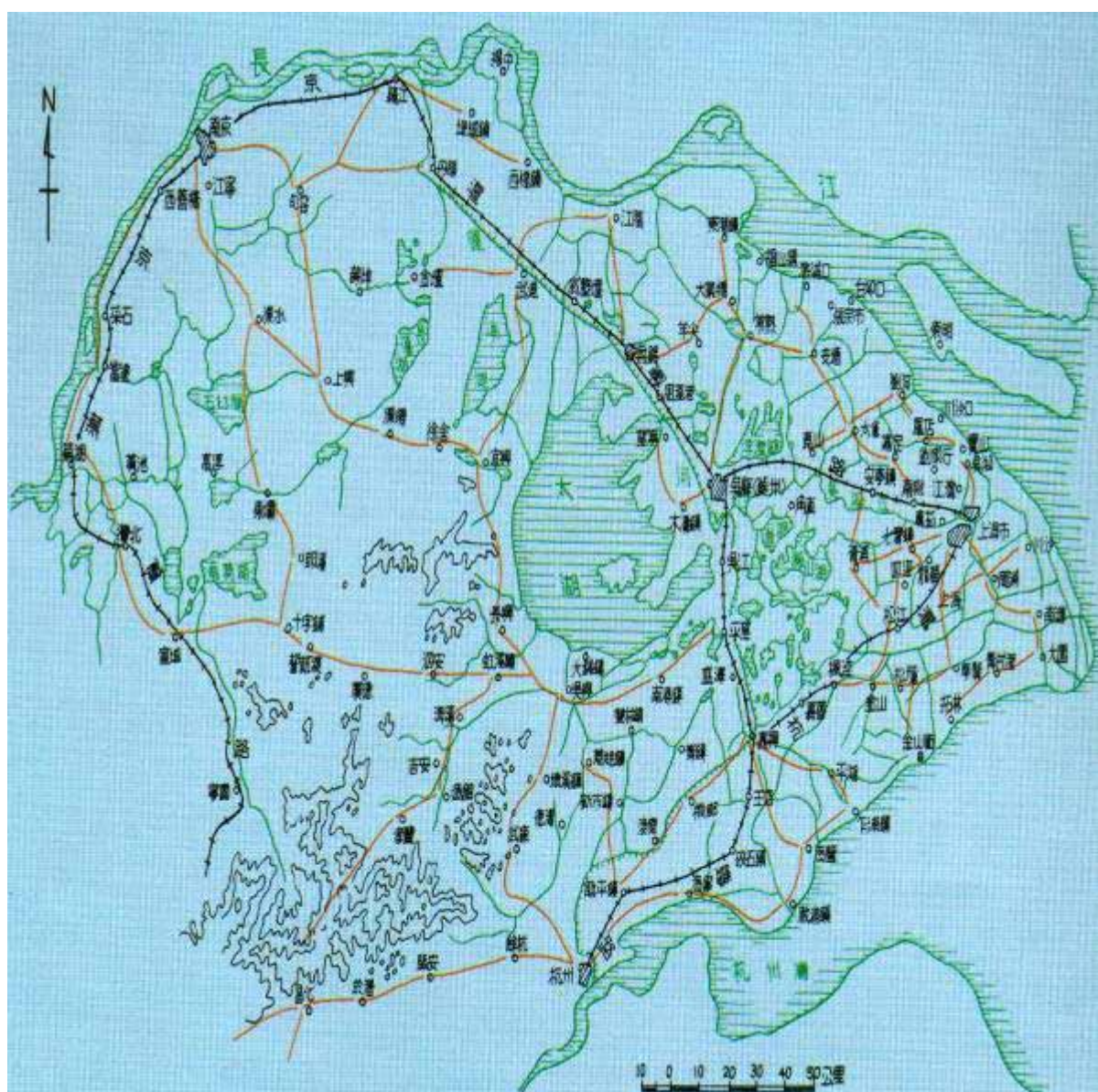
註^{③③}，楊開煌，《中共外交政策中『臺灣問題』的探討》，（台北：東吳政治學報第四期，民國84年。）

註^{③④}，中國時報報導，（臺北：中國時報第十一版，民國90年8月25日）。

下。⑳」中共東山島演習雖然主要目標是針對美國的快速反應部隊，但國軍決不可以漠視之，誠如孫子說：「毋恃敵之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」，在兩岸軍事實力我消敵長之際，我們決不可依靠外力，應審慎研析對日抗戰「第二次淞滬會戰」，以因應中共軍事的轉變，落實建立具有「嚇阻的國力」，使中共知難而退，不敢貿然武力犯台，此為「安國全軍」的真諦。

註㉑，自香港文匯報報導，（香港：文匯報第一版，民國 90 年 8 月 23 日）。

要圖一 京滬杭地區地理形勢要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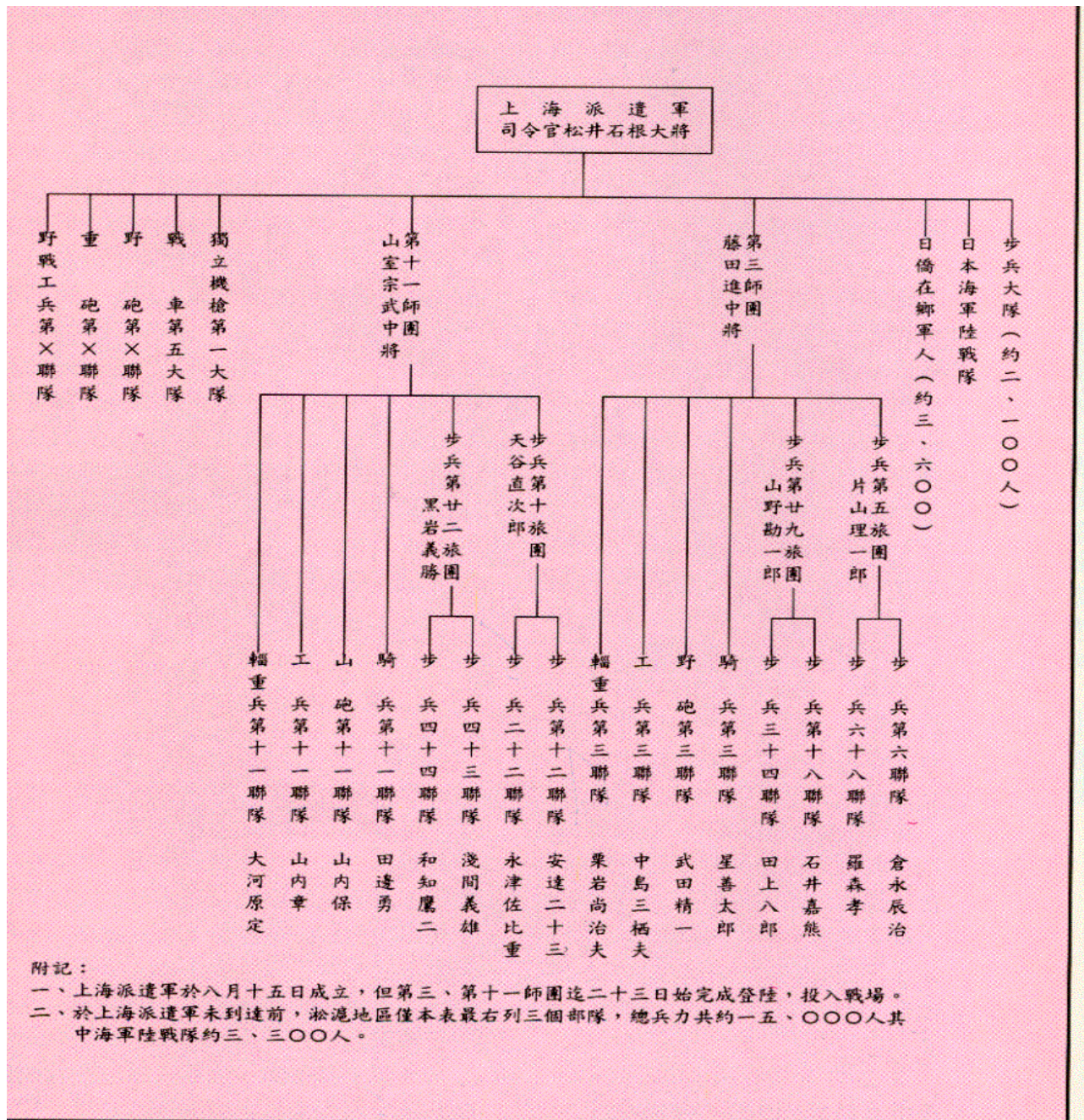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、王立民、陸軍學術月刊第 383 期，頁 45

附表一 淞滬會戰國日雙方師級步砲火力比

國軍調整步兵師（二旅制） 日軍昭和十二年甲步兵師（二旅制）依發射速度火力評分表			
區 分		國 軍	日 軍
一 分 鐘 發 射 之 火 量	步 兵 水 平 火 力	二九二・八	六二五・六
	步 兵 曲 射 火 力	一、九二〇・〇	六、二九九・一
	砲 兵 火 力	二、一七六・〇	六、五三〇・九
	合 計	四、三八九・六 （四・四噸）	一三、四五五・六 （一三・五噸）
戰 力 比 （由發射噸數之算定）		一	三・〇七
附 記	一、本表係參考「日本陸軍編制之概要」。 二、表內所稱「一分鐘發射之火力量」中，步兵直射火力為步槍、輕機槍、重機槍，曲射火力為擲彈筒、步兵重火器（曲射）等一分鐘發射之總彈量。 三、中、日兩軍火力比較，如國軍師總火力為（一）時，則日軍火力為國軍之三・〇倍。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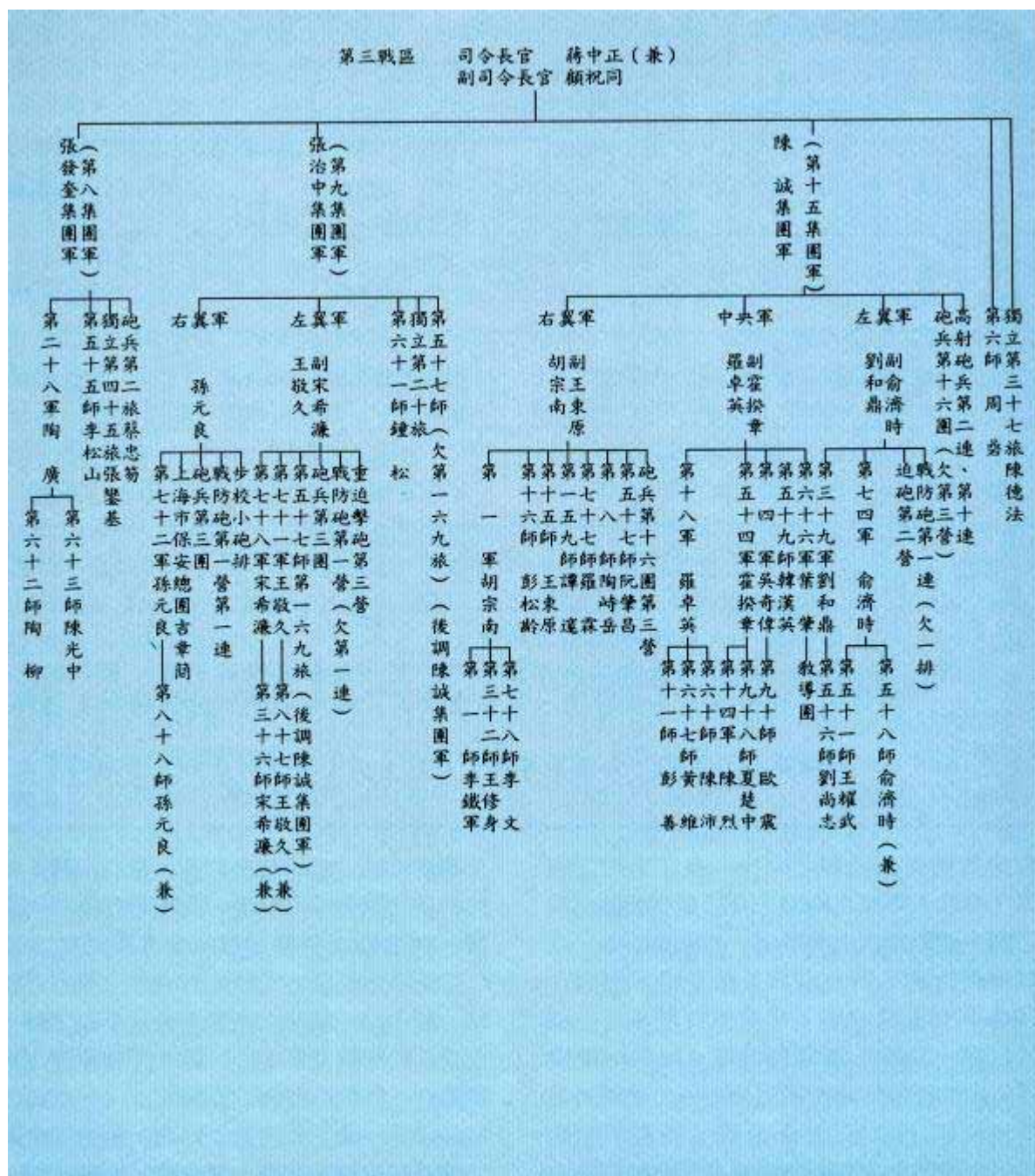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、王立民、陸軍學術月刊第 383 期，頁 48

附表二 淞滬會戰日軍指揮系統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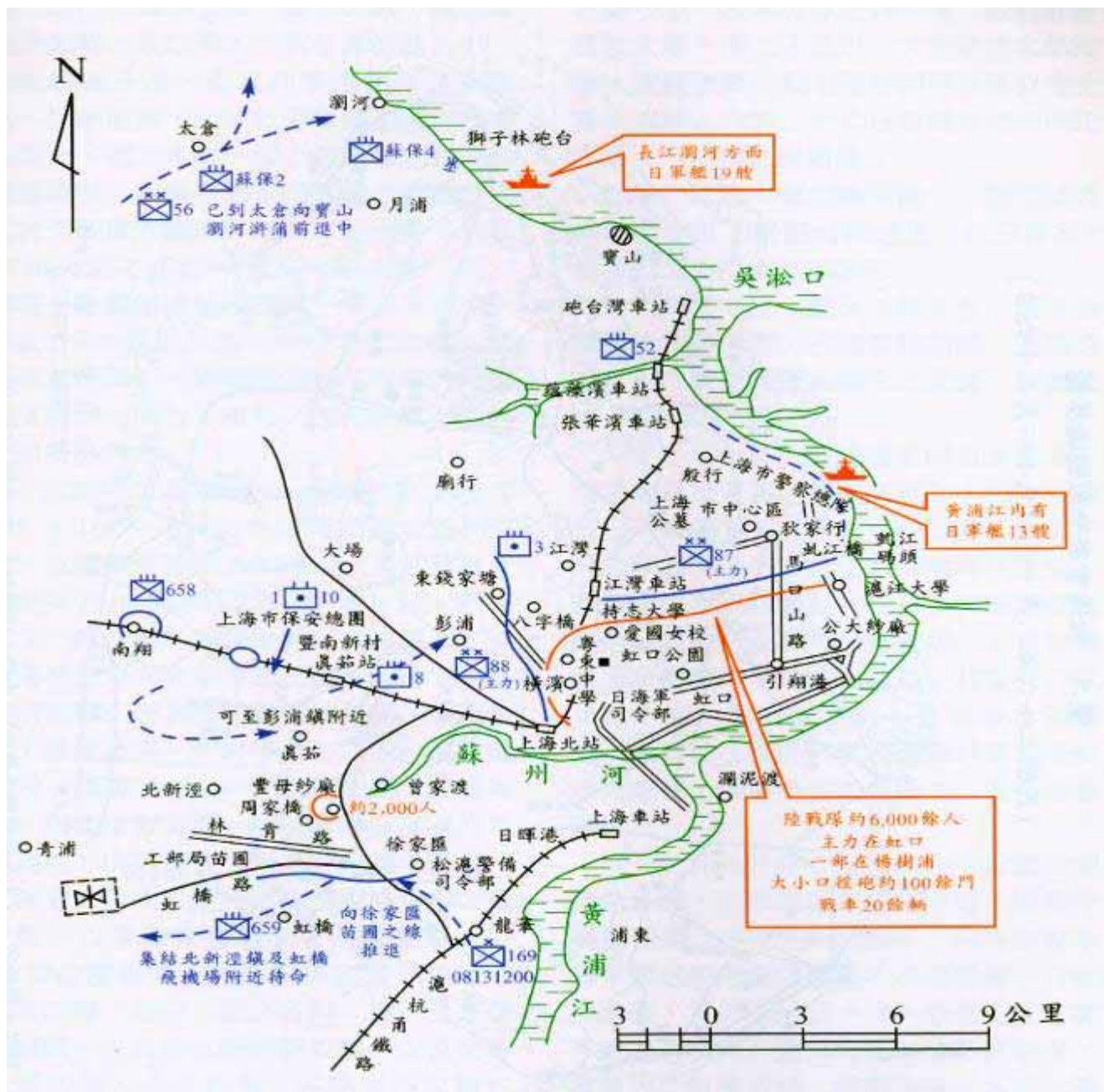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、王立民、陸軍學術月刊第 383 期，頁 46

附表三 淞滬會戰國軍指揮體系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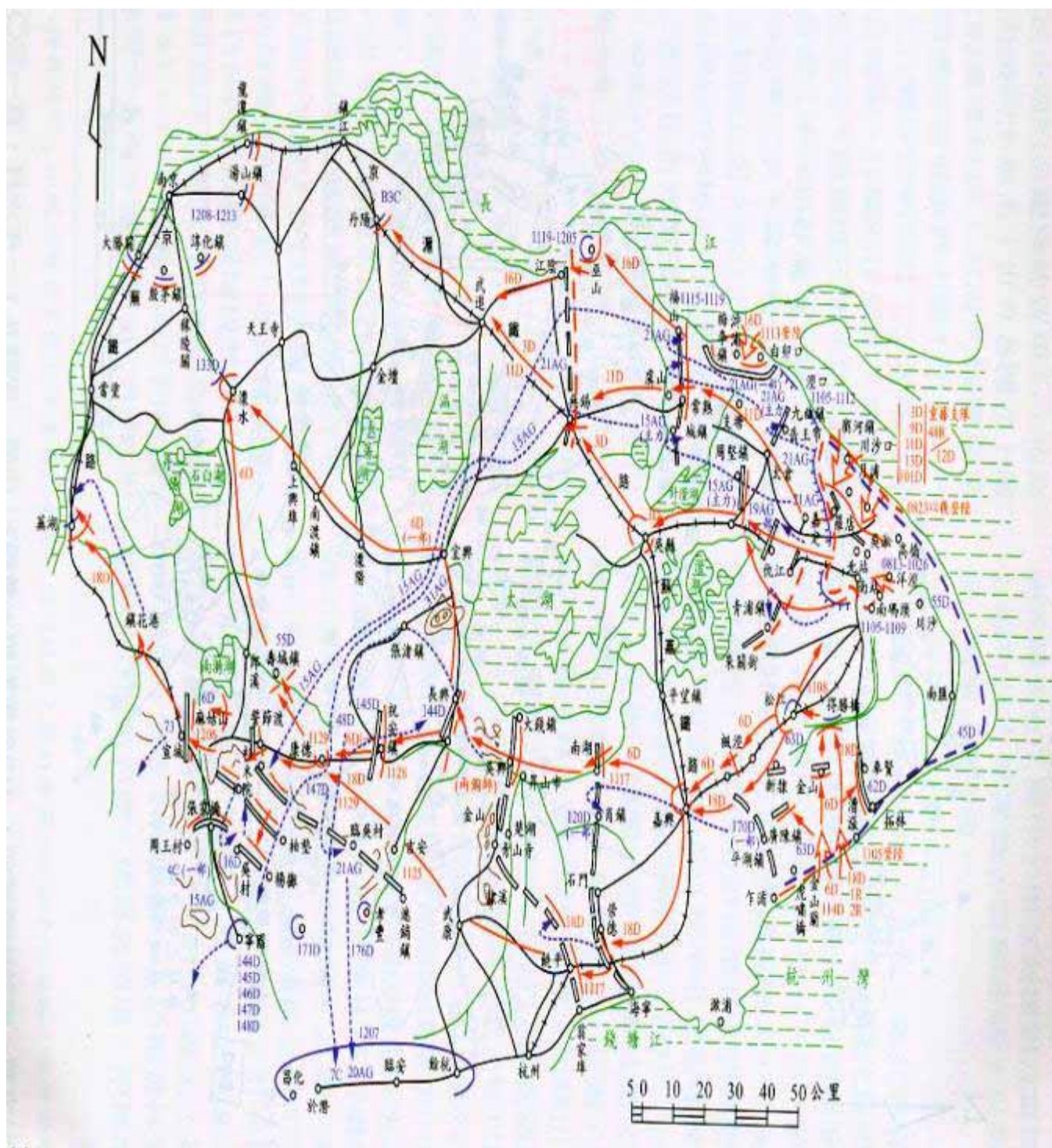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、王立民、陸軍學術月刊第 383 期，頁 47

要圖二 淞滬會戰前一般態勢要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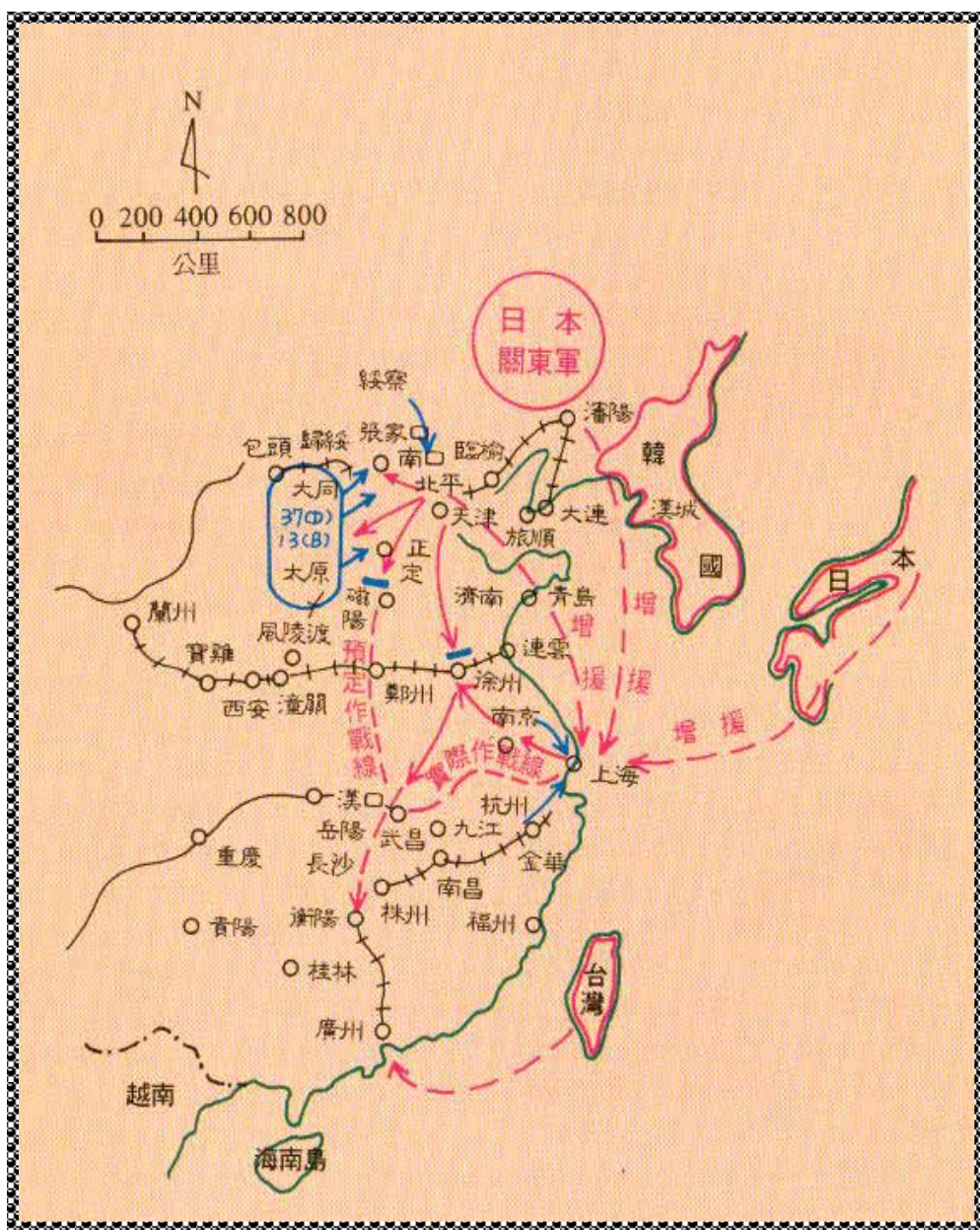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國防大學編印，《中外重要戰史彙編》，中冊，民國九十一年六月，頁130。

要圖三 淞滬戰役全般經過要圖



資料來源：國防大學編印，《中外重要戰史彙編》，中冊，民國九十一年六月，頁131。

要圖四 抗日戰爭日軍作戰線變更要圖



資料來源：抗日禦侮淞滬會戰之我見、王立民、陸軍學術月刊第 383 期，頁 58

要圖五 窮兵黷武日軍兇暴殘忍搜刮民資

